

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困境与行动策略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 AGIL 模型

朱镇豪,徐成立,田 静,李晓鹏,刘买如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 依托 AGIL 理论模型,对我国新时代乡村体育发展的核心议题——乡村体育赛事的发展历程、现实困境、实践经验及行动策略进行研究,有效梳理了赛事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研究认为,我国乡村体育赛事经历了 3 个历史阶段,即萌芽与适应的初步探索、目标达成与整合的机制优化、创新与维持的多元融合发展,面临着政策落地困难、体育氛围淡化、资源保障机制失效等困境。以“村 BA”赛事顺利出圈的实践经验,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发现:文体创新与经济驱动下的多维发展策略、产业融合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全民参与优化赛事资源配置、文化自信与民主共治赋能赛事长青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推手。乡村体育赛事应保障政策落地,促进赛事多元融合;激活体育氛围,强化组织监督职责;落实以人为本,自治管理下的资源协同;弘扬传统文化,加强赛事价值规范。

关键词: 结构功能主义;乡村体育;赛事;“村 BA”;AGIL 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 G80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3X(2025)03-0054-07

DOI: 10.20185/j.cnki.1003-983X.2025.03.010

Historical Logic, Current Dilemmas and Action Strategies of Rural Sports Events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GIL Model

ZHU Zhenhao, XU Chengli, TIAN Jing, LI Xiaopeng, LIU Mairu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Wuhan Hubei, 430000)

Abstract: Relying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AGIL, the study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realistic dilemmas,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action strategies of rural sports events, the core topic of rural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s new era, effectively sorting out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each subsystem in the event system.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hina's village sports events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i.e., initial exploration of sprouting and adaptation, mechanism optimization of goal achievement and integration, and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maintenance, and have faced difficulti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lution of sports atmosphere, and failure of resource guarante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Village BA tournament, it find that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driven by cultural and sports innovation and econom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o stimulate the new kinetic ener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articipation of all people to optimize the tourna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democratic co-governance to enable the tournament to be evergreen are the powerful driving force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sports events should guarant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of events, activate the sports atmosphere and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organization and supervision, implement the people-oriented resource synergy under the self-governance management, an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value of the event norms.

Keywords: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rural sports; event; Village BA; AGIL model

收稿日期:2024-09-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2YJA890013)。

第一作者简介:朱镇豪(1998~),男,广东深圳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乡村体育。

通讯作者简介:刘买如(1973~),男,湖南娄底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排球教学与训练,E-mail:139071686@qq.com。

乡村振兴是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而乡村体育的发展则是实现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文明办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打造‘三农’特色鲜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影响力大、可持续强的乡村体育综合赛事活动”“到 2035 年在全国培育 100 项以上最美乡村体育赛事”^[1]。这为赛事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环境和发展动力,使得各类“村赛”迅速崛起,成为充满激情

的、现象级的体育文化盛宴。而关于乡村体育赛事的研究成果,以往多倾向于赛事本身的现状扫描、组织执行或直接成效^[2],而缺乏对乡村体育赛事在宏观社会结构中的动态影响及其社会功能的探析。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体育赛事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途径,系统结构的改变也必然引起其功能变化。本研究从赛事发展的历史结构层面对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把握,对赛事模式子系统间的复杂关系给予充分的揭示和分析,以实现乡村体育赛事功能的充分发挥,为我国乡村体育赛事长期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提供有益的视角与启示。

1 结构功能主义与乡村体育赛事

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在20世纪中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获得广泛应用。该理论主张将社会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该系统由多个相互依赖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执行特定的功能,以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和平衡。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将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分析的核心,认为社会系统是由在功能上满足整体需要从而维持整体稳定的各子系统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强调不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作用。帕森斯所提出来的AGIL分析模型认为社会系统为了其生存和稳定,必须满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持4个基本功能。

乡村体育赛事是指在乡镇或农村地区定期开展的以村民为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以体育项目竞赛为主要内容,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展示传统民俗特色,促进村民身体健康和社会交往的社会性体育活动^[3]。这类体育活动已经超越了纯粹的身体运动范畴,成为深植于社会系统中的社会文化现象。使得乡村体育赛事不仅是体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关键构成元素,其发展受到了内源系统和外源系统双向互动的影响。而AGIL模型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在深入分析内部各功能模块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功能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反馈,为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理想模式。

在宏观层面,乡村体育赛事系统通过发挥4项基本功能,维持着自身的稳定与发展。社会适应功能体现在根据宏观政策和市场需求,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调整和优化赛事结构和内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趋势;目标达成功能强调了乡村体育赛事系统在实现“健康中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等国家战略目标中的作用和意义;整合功能主要体现为对我国乡村体育赛事系统发展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调配,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促进城乡文明、传统与现代、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互动和融合;而模式维持功能则是通过赛事来传承和加强社会核心的价值观和规范,塑造并巩固文化和身份认同,同时探索赛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微观层面,起源于贵州省台盘村“吃新节”的“美丽乡村”篮球联赛,经短视频的爆火而出圈,网友起名“村BA”。作为乡村体育赛事系统中的优质赛事,其本身也是一个稳定性较高的小型社会体系,既符合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的案例要求,又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当前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未来趋势和示范典型,为其他地区实现自身乡村体育赛事目标提供模式借鉴和实践经验。在“村BA”赛事系统中,社会适应功能主要

表现在保证赛事发展所需的基础资源供应,顺应政策环境和时代特点,增强乡村体育赛事的生命力;目标达成功能主要表现在“村BA”赛事目标的制定和达成上,包括乡村体育赛事的政策目标,经济目标,文化目标等;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村BA”赛事的资源整合和社会整合上,具体表现为人力、物质和商业等资源的统筹与管理;模式维持功能主要体现在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赛事运营管理的合理和规范,构建“村BA”赛事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

宏观层次的观察视角为探讨乡村体育赛事在微观层面的表现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村BA篮球赛事的深入分析,理解乡村体育赛事如何在具体层面上实践结构功能主义所强调的基本功能,并展示作为社会系统一部分的乡村体育赛事的运作模式;通过详细考察“村BA”篮球赛事,将宏观视角与微观实践结合起来,立足乡村体育发展的现状,汲取优秀经验,为我国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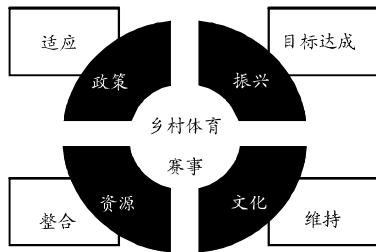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乡村体育赛事系统AGIL分析模型图

2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历史逻辑

以国家政策和体育赛事的基本构成要素为依据,将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

2.1 萌芽与适应:乡村体育赛事的曲折艰辛与初步探索(1949—1999年)

1952年国家体委成立并提出农村体育活动应当以结合民兵训练的形式开展。随后,中共中央在国家体委党组报告上的批示进一步指出农村体育应当为健康,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和国家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二大强调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并将开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局面作为农村体育工作的总任务^[4]。1986年9月中国农民体育协会的创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体育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对贯彻国家政策,团结农民体育积极分子,推动农民体育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和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1988年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京成功举办,是中国农民体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意味着中国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体育赛事。随着全国农民运动会的定期举行,各乡镇都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会,其项目设置,参赛资格和竞赛章程等方面也逐渐得到优化。

这一时期,乡村体育赛事主要呈现为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形式。赛事活动根据国家和政策的需要经历了内容、形式和规模上的重大变化,从最初以军事训练为主,逐渐转向适应全国农运会的框架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了中国政

策的重要转变,尤其体现在农村体育的重新定位上;摆脱了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束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的体育赛事发挥着丰富农民体质和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功能,并逐渐成为推动农村“两个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农村体育的普及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奠定基础^[3];另一方面,由于乡村体育赛事发展所应当具备的资源、机制和结构三大要素的不完善,体育赛事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发展受到限制,主要作为村民娱乐消遣的手段。这种情况下,乡村体育赛事在将社会成员整合起来,为村民创造互动交流的机会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乡村的各种社会关系;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期间,社会体育文化受到严重干扰,农村体育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性,成为弘扬革命伦理的特殊形式,如全国农村掀起的“学大寨”和“学小靳庄”活动^[5]。然而,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为体育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体育文化逐渐恢复,但由于赛事运营管理理念的不规范,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模式维持功能弱化,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推动群众体育发展中的潜力。

从宏观角度来看,农运会的驱动下乡村体育赛事呈现出脱离生活实际的“数据膨胀”现象,如数据显示1986年全国乡镇共举办体育比赛51万多次,运动员多达910万^[6]。赛事“兴盛”的背后掩盖的是发展的“盲目跃进”^[7]。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响应全国性的政策和指令,而非出于对地方体育发展内在需求的直接回应,基础设施的缺乏和过度依赖政府的集中组织模式也限制了其内生动力的生成,削弱了其自主性和创造能力。

2.2 目标达成与整合:乡村体育赛事的机制优化与网络构建(2000—2016年)

《2001—2010年体育改革发展纲要》《农村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一致强调了农村体育赛事的重要性,并将其提升至国家政策层面。这些政策共同关注到了赛事发展所必需的资源 and 机制性要素,对推动基层组织网络、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产生了显著影响。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以综合站为核心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管理体系的建设,加强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健全完善各级体育组织与综合站的协作网络,强调竞赛和体育氛围的培养^[8]。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乡镇公共体育健身设施100%全覆盖并推动社会力量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重心在于完善农村体育设施和体育组织网络,并尝试以体育赛事为抓手,开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对外交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适应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外部环境。依托国家层面的支持,系统不仅完善了农村的基础场地设施,还构建了基层组织网络,提升农村体育服务质量,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要,也促进了体育赛事和农村发展的协同进步;目标达成方面,乡村体育赛事系统则通过不断优化农村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实现农村

体育活动的广泛覆盖和深入推广,确保体育赛事在促进农民身心健康、丰富娱乐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目标更进一步的实现;体育组织网络化的建设为乡村体育赛事系统提供更紧密、协调的工作机制。在确保赛事发展所必要的机制性要素后,进一步整合资源,同时增强进城打工的中青年群体与乡村土地之间的联系,促进乡土认同的形成;伴随多项法规政策的实施,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运行机制与保障条件日趋完善,社会环境对体育认同进一步加强,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具体而言,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和多层级组织模式的构建使得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运营逐渐规范化,提升了对农村社区需求的响应能力,确保赛事活动更好地满足村民的实际需要和期望。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流程的取消,为农村体育精英、爱好者和“草根”体育组织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他们凭借对体育的深厚热爱,自发组建队伍、建设场地和举办比赛,从而在乡村地区掀起了一场体育竞赛的民间热潮。在城市支持农村的宏观背景下,乡村体育赛事也开始作为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桥梁,探索与旅游、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初步融合,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3 创新与维持:乡村体育赛事的多元融合与品牌塑造(2017年开始)

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首次提出,为新时代中国乡村体育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2017年农业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了要因地制宜的举办各层级的农民体育赛事以及打造具有乡村特征和传统文化底蕴的农民体育特色品牌赛事。这是国家首次在政策层将乡村体育赛事作为重点任务,表明了赛事对于乡村体育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此,国家陆续发文强调要优化体育资源配置,完善乡村体育设施,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喜爱的特色体育赛事,从而推动乡村体育的高质量发展。如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等十二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以‘美丽乡村’为主题,打造‘体育赛事+乡村旅游+传统文化+全民健身’多元融合发展的品牌体育赛事活动”,“引导支持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走进乡村举办体育赛事活动,到2035年在全国培育100项以上‘最美乡村体育赛事’”。由此可见,乡村体育赛事已经成为新时代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依托。

这一时期,观赏性和竞技性强的特色体育赛事已成为乡村体育赛事的主流,这一趋势既满足了公众高质量娱乐的需要,也与当前社会的竞技体育潮流相契合。同时以乡村特色和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赛事品牌进一步促进了体育与其他领域的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劲动力;乡村体育赛事系统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采用了“体育+”的发展模式,不仅促进了产业链的完善和经济发展,也通过赛事活动弘扬了乡村文化,实现乡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及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该时期的乡村体育赛事系统专注于整合专业人才和商业资源,引进裁判、解说员等工作人员提升赛事的专业性和观赏性,同时通过赞助逐渐推动赛事的商业化。“体育+文化”的赛事模式加强了农村社区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培养,并为乡村体育赛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文化及社会支持。

尽管当前多数农村地区的体育发展受到设施、服务和组

织等方面的限制,新媒体技术的推广却使得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体育赛事逐渐兴起,并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赛事已成为全国乡村体育发展的典范,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体育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乡村体育赛事成为消解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有效突破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

3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政策悬浮与数字局限,适应环境能力薄弱

当前,农村体育赛事系统与社会发展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匹配、不协调的问题。一方面,从适应政策环境的角度,尽管《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强调了体育设施建设在赛事活动开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但实际执行效率却未达预期,政策执行的悬浮现象显著。数据显示,目前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已实现全面覆盖,乡镇场地设施覆盖率超过88%,但形式主义泛滥和财政投入的不稳定,导致原本应被用于乡村体育发展的资源被挪用,进而阻碍了体育设施建设的有效推进。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体育经费的“挪用”问题尤为严重,不仅减缓了设施建设的速度,也破坏了设施维护的连续性,导致了“重建设,轻维护”的不良现象^[9]。其次,乡村体育设施的建设也呈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近年来,农村居民的体育需求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升级并多元化,但现有体育设施无论在数量和种类上均难以满足村民的需求^[10],且缺少针对比赛的适配性改造,如夜间照明、安保设施和观众座位等。随着乡村体育赛事的流行,大量外来游客涌入村庄进行观赛,进而导致了交通堵塞、厕所不足等问题的发生,严重影响了观赛体验和村民的日常生活秩序,限制了体育赛事的举办和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

另一方面,乡村体育赛事在媒体传播环境中面临着理念落后的挑战。在“人人皆媒”的数字化时代,赛事推广日益依赖参与者和观众的主动分享传播。村民不仅是赛事的观众或参与者,更要成为赛事传播的主体。然而,多数乡村地区缺乏有效的媒体资源供给和系统的媒介使用培训,村民数字素养普遍不高,导致乡村体育赛事无法有效适应数字媒体环境,限制了其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内实现有效传播和品牌建设。

3.2 氛围淡化与媒介缺位,目标达成路径受阻

目标达成功能要求系统将各类资源调动起来并逐步推进整体目标的实现。2035年在全国培育100项以上“最美乡村体育赛事”的发展目标,要求通过体育活动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充分彰显乡村体育赛事的健康中国意义,以赛事弘扬农耕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当前,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主要受限于两大因素:第一,部分农村居民体育锻炼意愿低,乡村体育氛围逐步淡化。这一现象源于多个因素:首先,体育活动在一些农村地区并非生活中的优先选择,尤其是在那些体力劳动仍占据日常生活主要部分的地区。其次,缺乏体育知识普及和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也导致了体育锻炼在农村社区的边缘化,从而加剧了乡

村体育赛事的组织难度^[11]。第二,部分乡村体育赛事未能有效激活新媒体渠道进行宣传和推广,导致其影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受损。在“村超”、“村BA”网络爆红后,许多地区借鉴了贵州经验开展类似的乡村体育赛事,但参与度与热度却远远不及贵州。这种局限性影响乡村体育赛事品牌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与旅游、文化和农业等产业资源的有效融合,限制了体育赛事在促进乡村全面发展中的潜力^[12]。

3.3 资源困境与主体忽视,整合效率有待提高

整合功能要求协调内部各资源之间的关系,为系统的有序运行提供保障。由于多数乡村体育赛事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整合挑战。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赛事专业人才短缺和体育管理机构普遍缺失等问题。解说员、裁判员、安保人员等工作人员是开展乡村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引导者和维护者,是乡村体育赛事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地区人口外流和空心化现象直接影响了农村体育人才资源的储备和培养^[13],导致在赛事过程中出现暴力事件时,未能有效预防或及时处理,损害了赛事的公正性和安全性^[14]。此外,“大办制”改革下,乡镇政府普遍缺乏独立的体育管理机构,大多依附于其他部门且缺少明确的体育负责人员,导致在项目申报和运作时出现组织动力不足和治理“边缘化”等问题^[15]。其次,大部分乡镇政府的日常运营也面临着财政不足的问题,截至2019年底,我国负债乡镇占总乡镇数仍在80%以上^[16]。资金来源的局限性,不仅影响了赛事的规模和质量,还导致了赛事组织工作的不完善,进而干扰了乡村体育赛事的开展效果。物力资源方面,乡村体育设施存在上文所提及的数量不足,类型单一和管理滞后等问题,加之财政资源有限,未能及时对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在社会关系上,乡村体育赛事存在着忽视主体人群的问题。随着赛事规模的扩张,组织者在资源分配和关注焦点上趋向于满足更广泛的观众需求,而非均衡考虑赛事各个群体的具体利益和需要。例如,大量外来游客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原本属于村民的观赛空间,迫使部分村民只能在家中通过直播观看比赛。这种不均衡的照顾导致某些社区成员感到被边缘化,减少了他们对赛事的参与和兴趣,进而破坏了社区的整体和谐。

3.4 文化断裂与制度缺失,赛事维模功能弱化

当前的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模式维持功能面临着文化和制度上的双重挑战。文化方面,乡村文化传统因人才外流而失去再生机制,文化生态持续退化,进而导致乡村政府在组织体育赛事时陷入缺乏文化动力的窘境^[17]。其次,多数乡村在组织体育赛事时,未能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具有历史沉淀的体育项目,导致赛事项目与村民锻炼习惯相脱节,难以引起群众的广泛共鸣。再次,一些赛事在组织过程中未能有效融合当地的传统文化元素,缺乏对地方文化特色的展示和传承。例如,榕江县在2021年策划的“大山里的CBA——首届侗年节篮球邀请赛”就未能深入结合侗族的传统文化,结果赛事影响力短暂,未能持续发展^[18]。制度层面上,作为一种新兴的赛事模式,乡村体育赛事缺乏成熟的制度规范来指导赛事的组织和实施。当前,多数赛事组织方将“热闹”的观赛景象当作赛事成功

的证明,并进行大量宣传,却忽略了其背后潜藏的安全问题:因观赛空间不足,大量观众被迫选择在梯子甚至是树上观看比赛,这一行为极大地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和紧急情况下的疏散难度,突显了赛事安全管理方面的缺失。乡村体育赛事的组织和运行涉及政府、市场、协会和村民等多重利益主体的复杂互动。然而,现行的制度框架未能有效协调这些关系,导致赛事的组织和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指导,进而削弱了赛事品牌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4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乡村体育赛事的典型案例分析——以贵州“村BA”为例

“村BA”篮球赛事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已经发展为覆盖东南、东北、西南及西北四大赛区的全国性乡村体育赛事^[19]。“村BA”的兴盛不仅展示了乡村体育赛事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现代发展路径,还彰显了其在推进全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适应性和影响力。以“村BA”为典型案例,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并探讨其在乡村体育赛事系统中的典型价值和实践经验,为振兴乡村体育赛事提供思路。

4.1 村BA赛事的适应功能:文体创新与经济驱动下的多维发展策略

社会系统的发展必须从各种途径获取资源,并对资源进行分配以达到适应内外部环境的目的。村BA赛事通过在传媒适应、经济适应以及资源配置和赛事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和调整,积极应对我国乡村体育事业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品牌化挑战下的发展需求。首先,在传媒适应方面,台盘村依托多元载体的共同传播模式实现村BA赛事品牌的持续性发展^[3]。通过实施“短视频+官方+名人”的多元化传播策略,将赛事推向更广泛的观众群体。同时,自媒体平台关于“村BA”赛事的多角度叙述促进了互动性讨论环境的形成,实现了信息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扩散。“村BA”赛事在传播策略上的创新彰显了体育与传媒融合的新趋势,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经济适应方面,“村BA”赛事依托体育本身良好的融合属性,在与旅游、餐饮、住宿等当地产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延伸其产业链条,依托乡村特色文化或自然资源,构建了“体育+”的多元乡村经济发展模式,在适应乡村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也与当今国家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战略相契合。

4.2 村BA赛事的目标达成功能:产业融合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目标达成功能是指系统根据环境的需求或者上一级系统的目标确定自身的目标次序,并调配资源去实现目标。贵州省开展村BA赛事的总目标在于通过打造乡村体育赛事品牌,促进健康贵州建设,并推动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最终有效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项目选择方面,台盘村立足自身深厚的篮球历史沉淀,将传统节日中继承下来的体育活动进一步弘扬,发展成为村民热爱且独具民族特色的乡村篮球赛事。在满足村民健身娱乐需求的同时,也孕育了“大庆大赛、小庆小赛、无庆自娱”的乡村篮球文化^[3]。赛事开展后,面对风靡全国的网络流量时,村组织积极采取措施,以民族文化映衬体育赛事。风趣幽默的方言解说,精彩动人的歌舞表演和独居特色的农副奖品共同营造了“村BA”赛场上的多彩民族风情。这些活动有助于将现代体育与传统乡土文化相融合,为“村BA”成

为特色赛事品牌创造了条件。台盘村还利用“村BA”赛事热度的杠杆效应,推动产业融合,形成“体育+农业+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通过赛事的开展实现以赛促建、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促兴的目标。

4.3 村BA赛事的整合功能:全民参与优化赛事资源配置

社会系统的稳定性与发展依托于其各构成部分之间紧密联系和协调一致。尽管“村BA”赛事系统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但已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方面展现出了较强的整合力度。在人力资源方面,得益于本土篮球文化的深厚根基,“村BA”赛事已成为外出务工人员与家乡之间的纽带,促使越来越多的村民在节假日回家庆祝和参加比赛。这种浓郁的篮球氛围中还培育出了众多的专业人才,提升了赛事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随着赛事火爆网络,警察、媒体等官方资源也被有效整合,确保“村BA”赛事的顺利进行。在财物资源方面,“村BA”赛事的资金通过村民自筹的方式募集,每位村民根据自身能力为赛事的成功举办做出贡献,包括球场的建设和维护,都是通过村委会的组织和村民的共同努力所完成的。在“全民参与”的体育精神鼓舞下,“村BA”赛事的整合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支撑。

4.4 村BA赛事的模式维持功能:文化自信与民主共治赋能赛事长青

模式维持功能是为了解决行动系统的持续性问题,系统的可靠运行取决于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环境的状态。就外部环境而言,“村BA”依托社会对体育和乡土文化的共鸣来维持自身的发展。“村BA”赛事深植于乡村传统文化之中,并在当地浓郁篮球氛围的影响下,打造了“体育+文化”的赛事品牌。乡村和体育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所产生的融合不仅有助于提升“村BA”赛事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更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激发社会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为“村BA”赛事的持续性发展注入文化动力。在内部环境上,台盘村的体育赛事组织和管理展示了其共建共商的内部规范。通过村民所组建本地篮球协会共同策划赛事的举办,包括规则的制订,用品的采购等。此外,台盘村通过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方式,集体讨论并决定体育赛事的治理与发展,这种民主的议事过程进一步证明了乡村内部强有力的制度规范和办赛观念,确保了体育赛事的健康发展与村民共同利益的维护。

5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行动策略

5.1 提升适应能力:保障政策落地,促进赛事多元融合

首先,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发展必须保障其所必须的基础资源供应,赛事内容与形式应当契合当前的政策环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基层政府组织保证各种政策的落地和执行。加强乡村体育器材的更新升级,针对比赛需要补齐场地设施的配置短板并建立健全人才组织的培养体系,消解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资源性限制,为乡村体育赛事其他子系统的发展提供支撑;其次,应顺应新媒体时代碎片化、海量、多样化等传播特点,提高乡村体育赛事的传播效率,培育相应的村赛市场和文化环境。为此,应充分发挥农村自然资源,构建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媒体传播模式,推行“体育赛事+旅游”的发展路径,在提高赛事社会影响力的同时打造美丽乡村的良好形象,从而促进乡村体育赛事的持续发展;最后,乡村体育赛事已然成为了现代体育项目和传统乡村文化碰撞交流后的产物。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这种融合不仅推进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城乡融合进程,而且还能发挥文化纽带的作用,加深国内外体育交流与合作,使乡村体育赛事系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时代趋势。

5.2 明确目标路径:激活体育氛围,强化组织监督职责

新时代下,乡村体育赛事目标根植于乡村振兴与全民健身的有机结合之中。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十二部门所发布的《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阶段目标:以“美丽乡村”为主题,打造品牌体育赛事活动,到2035年在全国培育100项以上“最美乡村体育赛事”;而根据系统服务对象的不同,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目标也会有所差异,对于农村政府和组织来说,乡村体育赛事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其目标是打造以体育为核心的复合型产业,打造良好形象,满足新时代群众的旅游需求,使赛事成为激活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对于参赛者来说,赛事目标则强调了以体育竞赛活动激励和满足人们的健身锻炼需要;对于观看者来说,赛事目标则侧重于满足观众游客的观赏需要;对于村民而言,赛事目标则是依托体育赛事传承乡村民族文化,提升村民的凝聚力,重塑乡土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因此,我国乡村体育赛事的总目标是通过策划与实施各类体育活动,提升农民的健康水平与文化生活质量,促进体育旅游与乡村经济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社会和谐及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激活乡村体育氛围,将赛事的组织、参与和宣传等方面与乡村特色深度融合,开展符合村民喜好的赛事活动,从需求出发,营造浓郁的体育赛事氛围。如赛事组织方面,立足村民自治,激发村民的民主活力;参与方面,调整赛事规则,降低参与门槛,促进全民参与;在宣传策略上,利用专业培训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以支持有效的信息传播^[20]。其次,确立乡村体育赛事的管理理念,各地乡村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构建职责明确的赛事组织和管理体系,区分各子系统职责范围的同时,建立多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以更高效地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再次,成立赛事监督部门,对赛事的组织、报名和实施过程进行严格的审核,避免“假球”“黑哨”等恶性事件的发生^[21]。此外,建立分层级的赛事体系,统一参赛资格和竞赛规则,满足不同层次的竞技需求并加强不同品牌赛事之间的合作交流。值得强调的是,在实施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目标达成过程中,必须综合考量各相关方的需求与利益,确保子系统目标的有效实现,从而保障总体目标的顺利达成。

5.3 完善整合机制:落实以人为本,自治管理下的资源协同

在乡村体育赛事系统中,整合功能旨在促进村民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并有效配置各种资源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首先,乡村体育赛事人力资源的整合包括赛事管理、运营和运动员等方面的人才。通过建立多元化的人才选拔与培养

体系,一方面从各类传统活动的筹备团队中遴选出具备赛事组织天赋的杰出人才,另一方面,为热爱体育赛事的村民提供系统化的成长路径和培训机会。同时,通过加强国内外的交流和培训,创造有利的人才发展环境,以提高乡村体育赛事的自治管理和服务质量。其次是物质资源的整合。应根据实际需求构建乡村体育赛事物质资源评估体系,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通过建立多方合作模式,共享场地与设备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以解决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此外,商业资源整合下,应有序推动乡村体育赛事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统一评估潜在风险和社会影响。村集体与赛事组织方应共同制定赛事商业发展策略,为本地特色农副产品提供推广渠道,平衡乡村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和乡土本色,避免外部资本过度介入,并通过建立多方合作的监督部门,实现共治共享的健康发展。最后,集体活动将乡村关系整合起来,满足村民精神需要的同时增添了生活色彩。体育运动中所蕴涵的竞技本质,在与其他地区的交流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强村民对自身乡村的地方认同,提升了乡村凝聚力。也因此,在乡村体育赛事的组织过程中,必须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落实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的办赛原则。一方面,通过专业培训使村民参与到赛事组织的全过程之中,通过调整比赛规则和竞赛形式,使男女老少都能享受竞技乐趣。另一方面,构建村民自治组织,广泛听取村民建议,确保赛事的组织和发展根植于群众需求,并最终惠及群众。

5.4 构建稳定环境:弘扬传统文化,加强赛事价值规范

为确保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持续发展,建立稳定的内外环境显得尤为关键。在外部环境方面,社会对体育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广泛认同,使得乡村体育赛事系统能够促进稳定的外部环境形成,从而确保其长期的稳健运行。为进一步优化乡村体育赛事系统的外部环境,赛事组织方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体育项目,打造“体育+文化”的独特乡村品牌^[22]。一方面,应挖掘乡村优秀的体育文化,举办广大村民喜闻乐见并参与性强的体育赛事,以满足村民的健身娱乐需要。另一方面,应传承和弘扬乡村民族文化,提炼乡村文化特征,以各具特色的乡土精神内核对体育赛事活动进行创新性改革,丰富赛事的文化内涵,推动体育项目的中国化,重振新时代中国乡村的文化自觉。其次,应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融媒体传播模式^[23],以赛事精彩瞬间为载体,传播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拉近城乡之间的文化距离,激活社会各界对乡村体育文化的关注,以此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乡村体育赛事系统内部环境的稳定则依赖于规范化的赛事运营体系。在顶层设计层面,培育“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赛”的价值理念,形塑赛事主体的主人翁意识,将乡村体育赛事的模式维持从机械化,简单化的工具活动,内化为致力于维持价值秩序的可持续治理^[24];在完善赛事管理运营体系的同时,明确赛事执行过程中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归属,强化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提高赛事运营管理效率;在组织执行层面,建立赛事监督运行机制,保证观赛空间和医疗资源的落实,统一赛事规则和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并对赛事的商业化合作实施严格把控,推动赛事运营管理的公正透明;在评估优化层面,构建乡村体育赛事的评价和反馈机制,积极收集来自参赛者、观众及社会各界的建议,立足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确保村民参与的基层民

主贯彻到乡村体育赛事治理的全过程,促进赛事运营管理的持续优化。

6 结语

乡村体育赛事,根植于我国乡村的深厚土壤之中,已成为推动社会和谐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桥梁。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体育赛事的振兴不仅仅是地方层面上对体育产业的激活和探索,更是在社会层面上对乡村价值和乡土文化的重新诠释与普遍认同。在AGIL分析视域下,乡村体育赛事经历了从被表达到主动表达的转变;而乡村也通过体育赛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形式和内容的更新,更体现了乡村社会发展动力与自我表达方式的根本变革。因此,乡村体育赛事不仅是简单的竞技活动,它已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学者需要更多地关注乡村体育赛事的长期效益,从实证角度探究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下乡村体育赛事的价值与功能,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乡村力量。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国家体育总局,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23-05-22)[2024-10-1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8286.htm.
- [2] 冯俊翔,郑家骥.群众体育赛事助力乡村振兴的价值、经验及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3(3):10-16.
- [3] 代向伟,凌媛,郭修金,等.我国乡村体育赛事振兴的历史机遇、实践经验与启示:以台盘“村BA”为例[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2):45-52.
- [4] 胡庆山,陈国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体育工作历程回顾、经验启示与战略路向[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5):15-20+33.
- [5] 卢文云,熊晓正.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启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4):455-457.
- [6] 郭修金.新中国农村体育的演进历程及阶段特征[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37(5):42-46.
- [7] 唐永干,王正伦.从他组织到自组织:农村体育的历史抉择:从江苏农村体育说起[J].体育文化导刊,2004(11):3-6.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关于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农村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EB/OL].(2010-06-29)[2024-10-10].<https://www.sport.gov.cn/gdnps/html/zhengce/content.jsp?id=25528720>.
- [9] 肖坤鹏,张铁民.相对贫困治理中体育的功能及实现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1(9):23-28.
- [10] 周彪,王华燕,陈元欣.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公共体育设施发展现状及提升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23(11):1-6+51.
- [11] 杨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体育发展路径探析[J].湖北体育科技,2023,42(4):320-323+340.
- [12] 张晶晶,殷海涛,陈曼,等.“村+”赛事越来越多,为啥都没贵州火?深度调查[EB/OL].(2023-07-28)[2023-12-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2620769450302530&wfr=spider&for=pc>.
- [13] 胡庆山.乡村体育振兴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路径:基于新华村的实证研究[J].体育科学,2023,43(5):10-19.
- [14] 刘宜昕.官方回应江西一“村BA”赛中两队打架,保安一旁观战[EB/OL].(2023-11-21)[2024-02-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3140047781783842&wfr=spider&for=pc>.
- [15] 张向荣.乡村振兴战略下乡镇体育治理能力提升行动逻辑、困境与对策[J].体育文化导刊,2022(2):35-41.
- [16] 李永友,王超.集权式财政改革能够缩小城乡差距吗?基于“乡财县管”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4):113-130.
- [17] 刘博.精英历史变迁与乡村文化断裂:对乡村精英身份地位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J].青年研究,2008(4):44-49.
- [18] 澎湃网.贵州村超?村BA为何火出圈?[EB/OL].(2023-07-27)[2024-04-1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010434.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的通知[EB/OL].(2023-06-05)[2024-03-1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5148.htm.
- [20] 吕钊.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体育治理的实践逻辑与因应策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2):64-73.
- [21] 红星新闻网.贵州村BA赛区冠军被质疑小组赛打假球?官方:不算打假球,未尽全力比赛已被罚[EB/OL].(2023-08-14)[2024-04-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4202099572764473&wfr=spider&for=pc>, 2023-08-14.
- [22] 尹莉君,高雪婷.体育特色村庄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思路及实践路径[J].湖北体育科技,2023,42(9):787-792.
- [23] 刘海涛,周晓旭,王宜馨.贵州“村超”现象级传播的生成逻辑与传播效应:基于知识发酵理论的视角[J].体育与科学,2023,44(5):15-21.
- [24] 陈高朋,王鑫,李跃.中国乡村体育赛事治理的互动机制与模式创新:基于价值治理分析框架[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5):11-26.